



燕京论坛
2010

*The Context to be Translated:
The Language, History & Esthetic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被译介的语境

跨文化交往中的语言、历史与审美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燕京论坛

2010

被译介的语境

跨文化交往中的语言、历史与审美

The Context to be Translated:
The Language, History &
Esthetic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译介的语境: 跨文化交往中的语言、历史与审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7

(燕京论坛)

ISBN 978-7-5097-2414-9

I. ①被… II. ①首… III. ①汉字信息处理-研究
IV. ①H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1429 号

燕京论坛 2010

被译介的语境

——跨文化交往中的语言、历史与审美

编 者 /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关志国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白云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黄 丹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1.25

版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 369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414-9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左东岭

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与校教务处、图书馆于2003年联合创办的“燕京论坛”（最初名曰“人文学术论坛”）至今已经有6年的历史了。在这6年中，世界与中国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论坛也伴随着这些变化经过了不断的总结与调整，但其基本原则没有改变，这就是坚持其前沿性、交叉性与多样性。这些讲座中的许多话题是对目前生活中所发生的许多新现象的探索与分析，以便使听众能够对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及时地进行了解并理性地加以把握。其中有些话题尽管是古代的或传统的，但无论是其所拥有的观念还是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都是颇为新颖的。交叉性则是指讲座内容并不限于文学的或语言的，这些讲座的题目尽管语言文学所占比例较大，但尽量囊括了所有学科领域，尤其是交叉学科领域，以便能够触类旁通。多样性则是指讲座内容的广泛包容性与个性多样化，使主讲者能够充分表达自我的学术见解与个性特色。

从前沿性、交叉性与多样性这些特性看，论坛的性质与大学课程的学习具有明显的差异。从学习的角度讲，它们当然可以作为课堂知识的补充，因为从这些讲座中可以了解新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但论坛更重要的目的是开阔视野，活跃思想，增加见闻。因为就本质意义讲，大学既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能力的课堂，更是提高公民素养、提升人生境界的场所。因此，增广见闻与活跃思想乃是一所大学所必须拥有的内容。这也是我们能够始终坚持不懈地举办人文学术系列讲座的直接动力。

讲座举办6年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它不仅使本校的师生受益良多，而且逐渐吸引了其他高校的听众，影响越来越大。然而，受场地与时间的限制，许多校内的师生难以全部聆听，更不要说其他院校的听众了。而我们聘请的这些学界同人，大都是国内的一流专家或者是活跃于学术前沿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所讲内容如果仅仅是一次性的行为，就会浪费这些宝贵

的学术资源。鉴于此，我们依照惯例，对各位学者的演讲内容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并征得主讲人的同意，将其结集出版，以飨广大读者。希望这些讲座能够使更多的人受到启迪，则此项活动非但使我校师生受益，更当嘉惠于社会也。是为序。

2009年6月30日

目 录

CONTENTS

序	左东岭 / 1
语言、文化、翻译：全球化与反霸权	谢少波 / 1
如何塑造主体	
——福柯理论的总主题	汪民安 / 25
中国的语言保存工作	曹志耘 / 40
探寻进入“历史”的路径	赵 园 / 53
近二十年中国散文发展历程	韩小蕙 / 69
汉藏系语言类别词的比较研究	洪 波 / 81
21 世纪的中国散文	林 非 / 102
有关唐人小说教学的省思	谢海平 / 119
日治时期台湾遗民诗人的心灵图谱	余美玲 / 139
中国电影长远发展的焦点问题	周 星 / 149
中国崛起进程中的身份与责任	肖欢容 / 163
国际传播的现实逻辑	陈卫星 / 179
汉语音韵学的功用与研习	冯 蒸 / 195
后文化研究时代的美学	高建平 / 203
数字艺术学科之当代地位	肖永亮 / 225
文学的普泛价值与本土精神	贺仲明 / 234
普罗文化的政治性与世界性	
——小林多喜二与 1930 年代中日左翼文化	赵京华 / 248

他结巴了

——鲁迅与现代汉语写作 黄子平 / 264

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若干思考 李宇明 / 282

从戏曲论治学 曾永义 / 293

艺术的阴谋

——西方现当代艺术概观 河 清 / 301

双语教育政策的新动向 周庆生 / 326

后记 张桃洲 / 335

时间：2010 年 3 月 3 日（周三）18:30

地点：北一区图书馆一层学术报告厅

主讲人简介

谢少波 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英文系教授，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 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西方文学批评史、后殖民文学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著作有《抵抗的文化政治学》、《文化研究访谈录》（合著）、《另类立场》等。

主持人（易晓明）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英文系谢少波教授来作学术报告。谢教授同时也是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座教授，他在 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西方文学批评史、后殖民主义批评等文化理论方面都颇有建树，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我们今天能请谢教授来给大家作讲座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谢教授在国内出版的著作有《抵抗的文化政治学》、《文化研究访谈录》（合著）、《另类立场》等。谢教授今天的讲座是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仅两周前在海南大学做过一次同题演讲，现在来我们这里是他的最新成果的第二次宣讲。下面我们热烈欢迎谢教授给我们作演讲。

语言、文化、翻译：全球化与反霸权

谢少波

谢谢易教授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见面，分享我的心得体会，讲完以后大家可以交流交流，使我这次北京之行多一点收获。这个稿子是我两周前在海南岛写的，当时我的老朋友韩少功先生邀请我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和

《天涯》杂志编辑部、海南作协作个报告，我就写了这个稿子，这是第二次讲。我的题目是《语言、文化、翻译：全球化与反霸权》（Language, Culture, Translation: Globalization and Counterhegemony）。这个题目好像是把一些不相关的词语放在一起了，经过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之后，我们都知道词语的排列、事物的排列没有必然性。写文章的人、说话的人似乎可以把一组词语、一串事物任意排列，但是一经排列以后，你得让别人看出排列的逻辑，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本文就是给大家交代一下这几个词之间的关系。这里面核心词应该是翻译，文化翻译，最近几年我对翻译越来越感兴趣。我是学文学理论出身的，博士论文和读博期间的研究领域都是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最近十多年来专注于后殖民、全球化、文化研究，还有现代性，要搞现代性研究就必然牵扯到翻译，因为所谓的现代性发源地在西方，在欧洲和北美。然后，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带动，西方发源的现代性向全世界扩散。这样一来，西方乃至各个地方衡量本地区现代性或现代化程度的时候，往往使用西方所定义和专宰的概念来衡量。研究现代性就必然要研究翻译。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19世纪中叶，当然这个时间还可以往前推，实际上在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些思想家如黄梨洲（黄宗羲）、顾亭林（顾炎武），已经有了一些反传统的新思想，这是中国本土的现代性萌芽。但是作为一个系统的话语，作为一种思潮，现代性的出现则是在20世纪初。19世纪中叶，林则徐组织了一大批翻译家翻译外国著作，后来严复又翻译了《天演论》等西学名著，他们对五四前后一批开现代性先河的领袖们、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有很大的影响，包括鲁迅、陈独秀、胡适在内。我这几年对现代性颇感兴趣，并做了一些研究，并且喜欢思考翻译问题，尤其最近这几年。我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英语系教书，带研究生，作为一个在北美大学英语系教书的中国人，我每天都阅读两种文字，每天吃完饭都要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上Google中文网站，看中文；跟家里人和朋友们聊天，打电话跟王宁、王逢振、汪民安这些朋友们聊天都是用中文。但是我毕竟吃的是英语饭，教的是英文，所以每天在学校里我讲的都是英语，看的也都是英语。一到家里英语和中文基本上是二分开。我个人的文化背景和经历，决定了我穿梭于两种语言之间，对国际公用和普世概念在跨越语言文化疆界时的置换和变异与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不可同化或不可消除的差异有一些心得和体会。

由于我的研究涉及许多后结构主义理论，使得我在用一个词遣词造句

时总是顾及这个词的反弹力，就是你用得是不是确切，这个词是不是会留下很多暧昧空间，是不是会留下很多不稳定意义空间。我觉得光讲文化不行，一定要文化、语言一起讲，因为文化和语言紧密相关，语言不仅是一套符号，就像一个袋子里面装了一些东西。不光这样，语言本身就是意义，就像俄国形式主义讲的形式即意义。美国的米勒先生说过 *media is ideology*，所以语言不仅仅是表层的东西，它本身就是内涵，就是意义。同理，文化不仅不能和语言分开，讲文化差异归根结底上是讲语言上的差异，是语言的问题。比如说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里的“仁、义、礼、信、忠、孝”等概念，这些在西方社会和西方语言里是没有的，那该怎么翻译？再比如刚才有个学生问我老师你累吗，我说不累，我到那里打个坐，说完了我马上意识到，“打坐”在这里可以说，但是在北美对西方人说“打坐”，就不容易懂了。“打坐”英文里常被译成 *doing meditation*，但是我不是 *doing meditation*，“打坐”在中文里包括调形、调息、调气、调心、调神。“仁、义、礼、信、忠、孝”这些词在英文或西文里没有对等词，如果要翻译的话，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将这些概念音译，然后下注解。因为在西方语言文化里没有对等词，首先是因为在英、法、德等语言里压根儿就没有这些概念。又如钱穆先生讨论过“道与理的区分与纠缠”，在西方也没有，首先没有道与理的区分，然后没有哲学家三千多年来对道与理孜孜不倦的纠缠。今天我们会说：“你这个人讲话没有道理。”“你怎么这样说？这样做事？没有道理。”道理在英文里翻译为 *reason*，不讲道理可译为 *unreasonable*。可实际上钱穆先生认为“道理”原本是分开的，在中国哲学史，这个道与理之间的争论比较多，首先是有道，然后谈道理。道家的老子、庄子讲道，孔子也讲道，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先秦两汉的人都讲道。到了汉朝的时候，就开始讲理，宋代的时候陆九渊、朱熹、二程就讲理，所谓宋明理学。这个道与理的区分在西方是讲不清楚的，这也是中国语言决定的。

那么道理到底怎么区分呢？钱穆先生的意思是：“道”有主体的介入，“理”不牵涉主体的介入，是不因人因地而异的客观的东西。比如说，我从北京到海南岛去，必须乘汽车，坐火车，或者坐飞机，这是个理。但是既可以直接走，也可以绕道走，你怎么走，用什么方式走，是乘火车还是坐飞机，这个决定就是道的问题。古人讲“道行之而成”，道是人走出来的，所谓道，就是 *way, path, road*。人都想过好日子，这是个公理，但怎样过日子，怎样组织时间和空间，这是个道的问题。大而言之，文化属于道的范畴，科技属于理的范畴。比如说每个社会都是由性格迥异、有欲望、希

望得到别人承认的个体组成的，每个社会都遵循某种秩序，组织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这个理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每个社会只要能运转，就必须有秩序“order”，order决定了一切，你不能乱来，有法、有规则、有伦理，有一定的方式，这是个理。但是不同的社会按照不同的理念和秩序，组织它的经济、社会、文化、伦常生活，这是道的差异，文化差异。这样一来，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各有一套不同的时空、认知、价值和伦常概念，这就是道的范畴。道与理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在中国喋喋不休争执了几千年，在西方就没有。反过来，西方关注的东西我们中国未必关注，比如关于 being 的争论，在中国就没有。海德格尔的 being，意思是 dasein，即 being-there 或 being-with，如果直译为“存在”，其中有一些重要内涵就流失了，但是没办法。海德格尔自己很多著作里有希腊语、拉丁语，他也没有翻译过来，他还专门讲到，不可翻，不可译，只有用原文。足见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存在不可互译的概念。

我今天演讲的大意用几句话概括一下就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对世界现象进行分类的方式不尽相同，不同文化之间在语意上和观念上都不存在直接的对应，由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关注的事物不尽相同，价值取向也有很大的差异，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少无法消解的差异，普世概念在实际生活和实际话语中不具有普世性。这是我的一个基本 thesis。

普世概念在实际使用中具有千差万别的文化形态，也就是说 culture-specific articulations of universality。同一个普世概念在不同语言 and 不同文化语境里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内涵，这说明没有普世性，普世概念常常被霸权所利用，在实际话语中，在实际生活中失去了普世性。一方面，我们当下使用的许多概念实际上是美、英等西方国家先入为主，他们定了调子，搬到中国来的时候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一旦进入中国，为中国人所使用时，也一定会被修改，被注入新的内容。这里面有一个霸权与反霸权的问题。任何霸权的施行，必然会遭遇抵抗。比如大家都在讨论的全球化，就是这样一个霸权和反霸权过程。全球化是个双刃剑，既加强霸权，也削弱霸权。比如说英语，无疑是霸权语言，也就是 global language 或 international language，就是世界语。到中国，到马来西亚，到日本开会或讲学，都要使用英语，确实是加强了英美的霸权地位。但是同时也削弱了它的霸权地位，一旦英语被全世界各个国家所用，它就在各地被修改，有各地的版本，比如有香港版本、南非版本、马来西亚版本、新加坡版本，出现了很多新词，然后再回到英语发源地或大本营里去。比如说 long

time no see 这个句子，意思是好久不见了，但是这句话原本是中文直译过去的，现在居然成了地道的英语。类似这样的例子在英语里还有很多。一旦英语被各国、各地区使用以后，英国和美国对英语就失去了控制力，所以现在讲，Englishes, not English, 是复数而不是单数。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全球化给非西方或原第三世界的人们反霸权提供了绝好的空间。非西方或原第三世界的民族、人民可以以翻译为策略重新洗牌，修改和扩充各种议题，修改和扩充各种普世概念，以求实现真正的国际民主。

有很多人说 21 世纪是生态环境世纪、生化世纪，21 世纪是以中国为首的东亚经济复兴世纪，这些都不错，但是我认为 21 世纪更是一个翻译的世纪。全球化愈演愈烈，无孔不入，所谓全球化就是文化、具象、叙事、思想、技术、情感、商品等各种东西的跨国界、跨地域流动。在全球化时代，不同语言、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一起居住、一起开会、一起生活，这样一来就更需要翻译了，每时每刻都需要翻译。如果翻译到不了位，或者意思传达得不公正，就无法实现有效的沟通，所以翻译越来越重要。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大家都像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有什么事大家非得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谈，不能只有哪一方说了算。我记得 20 世纪 60 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某年某月的“人民日报”社论，有一句这样的话：“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上谁也不怕谁。”我觉得这句话在今天非常适合，就像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宣言》里前五六页读起来很亲近，好像马克思、恩格斯就是昨天写的，完全适合今天的世界。德国的一个理论家（Ernest Mandel）就说过，马克思对资本的描述更适合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今天更加成熟。至于“当今世界上谁也不怕谁”，今天不管是个人之间、群体之间，还是国与国之间，每个人都可以对别人说不（anyone can say no to anyone else）。妄自尊大、蛮横无理是行不通了，只有坐下来协商才是办法。确实，大家如果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协商，那么就需要很好的翻译，耐心地、细致地听取对方的意见，尤其是心平气和、耐心谦卑地听取对方语言的真实含义，然后再讲话。不管是什么人，甚至操同一语言的人，聚在一起谈问题，首先都得确定一下共同使用的概念，否则争了半天到头来成了驴唇不对马嘴，答非所问，攻非所守，白忙乎了一阵。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每时每刻都需要翻译，所谓翻译，就是穿梭于两种语言文化之间，耐心谦卑地、非先入为主地聆听、理解对方。

那么翻译或者文化翻译与反霸权有什么关系呢？我这里有一点心得可供在座的研究生和年轻学者们分享。你们做学问的时候要记着这一点，谈

话、写东西都要从概念开始，从语言文字开始。我看别人的东西，一是先看作者的概念是否清晰，那些概念在该文本里的具体内涵；再就是先看前面四五页，然后再决定我是否继续往下看。我最重视的是句子，一个人的思想有没有质量，写的东西是否言之有物、值得读，首先要看他的句子。平庸、才华、深刻、肤浅，全在句子里。看一个人写的东西，首先从文字和概念开始，然后是句子。例如，看雅克·德里达、福柯、克里斯蒂娃或者钱穆的书，你就得先把他们的基本概念搞清楚。那么谈翻译，我觉得也有必要从头讲起。

什么是翻译？首先得回答这个问题。翻译就是 *translate*, *translate* 的意思就是 *transfer or move or carry from one place or one topic or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就是从—个地方、—种语境、—种语言把—样东西移到另—种地方、语境、语言中去。那么搞翻译的人，不仅是把—个意思从—种语言里移到另—种语言里，更主要的是要不断穿梭于这两种语言之间，穿梭于两种文化之间。所谓穿梭，恕我直言，国内许多译者根本就谈不上穿梭，也没有这个能力和耐心，他们的很多翻译是不合格的。很多翻译者，没有为了翻译—件作品去了解它的作者，了解作者的文化背景，了解他所属社会的习俗、文化习惯、审美趣好和历史。所以他们翻译的时候大都讲求文字上的意思，这样翻译的意义当然误导人了。语言太复杂，文本的意义精微层叠，须通体搞清楚才能下笔译。所以在两种语言之间做翻译，我认为就是不断往返、穿梭于两种文化之间，由此可见相似性和差异性，见出不同的价值体系、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概念，以及同一概念在两种或者多种不同文化中的不同形态和置换内涵。传统的翻译往往只见出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可译性，没有重视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可译性，无法调和和无法消解的差异性，那是因为过去人们都认为有超语言的普世意义，有 *translingual*, *tansnational* 的普世意义和普世概念，这些概念和意义不受特定语言的局限，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中、不同的地域中能获得同样的理解和解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索绪尔结构主义理论修改了这个认识。结构主义理论盛行后，大家的看法就大大改变了，因为索绪尔结构主义理论认为能指和所指之间或者文字与意义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符号是任意的，或者说是由文化语境决定的 (*culturally determinate*)。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在人类文化、人类语言出现以前，并不存在—套预设的概念，就像康德讲的超验的概念。而不同文化、不同语种的人，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分割现象世界 (*phenomenal world*)。如果

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概念，如果不存在普世语言，那么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就一定存在不可译性。这里我插一句，我刚刚讲的“仁、义、礼、信、忠、孝”在西方语言里没有，西方语言里也有我们没有的东西，举个例子，18、19世纪英国的 gentlemen，指的是一群有教养、有文化涵养、有一定社会地位、遵循一套行为举止规则的人，在中国没有对等的阶层，翻译成绅士不错，但得有解释意思才能到位。中国的婉约派、豪放派，在西方就没有；同样的，西方一些文学派、写作派我们也没有，他们的 cowboy、西部电影，我们没有；我们的牧童，“牧童遥指杏花村”里的牧童，西方也没有。

如果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概念，不存在普世语言，那么任何两种语言之间都不存在完全相等的术语和概念。既然不同语言之间不存在对等的词语和概念，那么我们的翻译就不是被动、机械、不偏不倚地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传递形象、意义、思想、叙事、情感 and 情景，而是一种置换、杂合和修改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见出的首先应该是不可译性，就是不可同化、不可消解的差异性。德国的批评家本雅明关于翻译的阐述对当代的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本雅明的一个重要的奠基概念是他异性 *foreignness of languages*，指的是不同语言各自固有的和不同语言之间的他异性，不可消解、不可逾越的不可转译性，他说各种语言之间有一些 *irreducible foreignness*，就是我说的不可消解的他异性，这就使得跨语言文化的传达困难重重，一切翻译在他看来都是对某种语言他异性的暂时处理，最终最佳的处理永远不会到来，只可以说日益趋近。翻译的文本成了脱离文化、文学、社会语境的孤零零的片段（fragment）。本雅明的 *foreignness of languages* 给一系列的立论提供了基础。翻译既不可能又属必要，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个两难境地。同样的文本可以有无数的译本，于是翻译就变得很有意思。

翻译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它里面有很多可能性和可以挖掘的东西，尤其是反霸权潜在空间。不只是东、西方之间存在霸权与反霸权，国家内部的不同阶层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也存在霸权与反霸权。我们是同一个民族，是同一个语言群体，都讲中文，但在交流过程中也有翻译的问题，两个人之间也有翻译问题。你所言的物和我所言的物不完全一样，你所用的概念和我所用的概念内涵也不完全一样。巴赫金有几个概念，一个是多语言，就是说一个民族可以有多种语言，如加拿大就是双语国家，在任何地方都有法语和英语；另一个是 *languages within languages*，即 *heteroglossia*，

复合语言，由于一个社会有不同群体、阶层、阶级存在，所以同一语言里有不同的用法、不同的习惯语、不同的词汇组合。如工人和教授们讲话用词不一样，企业家和艺术家又不一样，就是说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还有不同的职业之间，有不同的语言。

由于语言是多层、多义、多解的，语言翻译是一个很大的意义不稳定空间。翻译既可以加强也可以削弱或挑战霸权体制，翻译给主体提供了决断空间。如果翻译是一个置换、杂合、修改的过程，而被翻译文本的意义永远是不稳定的，a huge space of indeterminacy。

任何不稳定性都是双刃剑，它既可以加强霸权，也可以用来反霸权。比如领导跟你讲话，如果你想从中作梗的话，你可以作所谓的曲解，即用你的方式来理解。因为我们用的语言，每个字都是个意义不稳定空间，既然语义是不稳定的，那么像巴赫金所讲的，每一个社会群体，每一个人都可以平等进入语言。一旦你进入某种语言，你就和千千万万同样使用这个语言的人对话了，只不过你看不见对话者而已。那么同样的语言，你可以这样用，我也可以那样用，每个人对语言的运用都有差别，因为语义有一个很大的不稳定空间，所以你可以按照你的立场解释意思 against hegemony。霸权的一方可以是政府，可以是某种主流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主导理论话语或宏大叙事，也可以是一个群体，也可以是一个个人。比如说课堂上老师就是一个 hegemon，看起来我也可以说是一个 hegemon，但是你们可以挑战我。所以翻译就给主体提供了自主空间，有助于实现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跨群体、跨国家民族之间的民主。霍米·巴巴由此认为，跨文化翻译解构原文的权威，使意义和权力都获得民主式的播散。

巴巴最有趣的论点是文化翻译或戏仿（mimicry）或模仿可以颠覆霸权、揭露霸权的短处和局限性，因为模仿和戏仿含有一种对被模仿文本或对象的嘲笑和扭曲。比如说，你去模仿一个人，总不可能和他一模一样，既然不一样，那么这个差异空间就是一个嘲笑空间。我去加拿大不久后，在电视广告里看到这样一个场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偏戴着帽子，口里说着“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跳摇摆舞，实际上莎士比亚本人和哈姆雷特这个角色都被嘲弄了。斯皮瓦克是另外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人，他在《文化即翻译》中说“translation as culture”，英语里很多地方 as 等于 is，也就是说“translation is culture”，斯皮瓦克还说，翻译是一种伦理行为。列维纳斯有个概念，叫做他者伦理，the ethics of otherness，翻译是一个 moment of being for the other, being for the other，即为他者而存在的人，也就是

说翻译要尊重原文本，原文本就是 the other。她认为要仔细、耐心地听取原文的意思、原文的含义、文内之意、言外之意等。虽然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角度不一样，却殊途同归。霍米·巴巴讲翻译是指从西方语言到非西方语言的翻译，斯皮瓦克讲的翻译是指从非西方语言移入西方语言的翻译，她认为不管是西方人翻译还是东方人翻译，把非西方语言翻成西方语言的时候，不要蛮横无理、张冠李戴式地翻译，应该好好地理解意思。比如说“仁、义、礼、信”，你先好好地理解解然后再去翻译。斯皮瓦克强调的是，要充分尊重原文的差异性、特性，把这种差异性和特性在译文文本中体现出来，宁可直译，也不能张冠李戴式地意译。最近两三百年来，西方对非西方文本的翻译都是充满暴力的，张冠李戴式的，把非西方语言、非西方文本强行纳入自己的术语和概念版图，也就是同化了后者，而不是保留后者的他异性和不可消解的差异性。她所指的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间的翻译，也可以指同一个社会、同一民族语言之内的翻译。斯皮瓦克强调独特性和一般性。在她那里有一组这样的二元对立，即标准语言与地方语言，霸权语言与非霸权语言，前者总是抹杀、无视后者，后者在前者的文本里没有地位或位置。举个例子说，当代世界流行的政治、经济、哲学领域里的语言和概念体系都是西方发源、产生、主控的，都是从西方的文化历史语境里滋生、延伸出来的，而非西方社会固有的历史、文化语言特征都在追随西方的过程中被定为过时、非现代（non-modern）、前现代（pre-modern）而遭到摒弃。关于这一点，请大家看看钱穆先生的书，还有梁漱溟先生写的文字。又如我前面提到，一个社会内部有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有城乡、贫富、治人者与治于人者（governor and governed）的区别，在这些分别中有一方总是被另一方吞噬、埋没或者抹杀、忽视。比如说我们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不管是国家的还是民间的现代性话语大都忽略了农村地区、贫困地区、边远地区人们的愿望、追求、审美、价值传统、历史资源、情感和感觉方式。这些群体的表达方式与语言特征、词汇不仅仅在标准语言里得不得尊重和体现，而且经常被看做落后、愚昧、土气的标志。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斯皮瓦克是在为这些国际间的或一国内部的弱势群体和弱势阶层谋取平等地位。

朱迪斯·巴特勒在《重释普适性》一文中发挥本雅明、巴巴、斯皮瓦克的翻译理论，提出翻译或文化翻译的目的在于凸显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和异质性，从而暴露霸权，认知暴力，她的基本论点是，普世性概念或表述在实际语境中永远具有文化特征，任何一个普适概念落在任

何一个文化语境里都要被修改。她认为公用的普世概念，如主体性、现代性、民主、人权等既为不同民族所用，就要涵括不同民族文化的利益、特征、愿望。普世概念应该是一个这样的空间，是一个大家都有一席之地的空间，是一个体现差异的空间。她在文中举了一个从斯皮瓦克那里来的经典例子，斯皮瓦克有一篇文章叫《从属群体能说话吗？》，她的结论是他们无法说话，有口难开，有话说不出。她的意思是，他们无法用自己的语言讲话，必须用一套强加给他们的所谓标准语言说话，一用标准语言讲话，他们就失去了力量。所以问题不出在他们被排斥在外，而是出在被剥夺、被强暴后才被接受进来。用齐泽克的话来讲就是 to be included out，接受条件是被接纳者必须遵守接纳者的语言和游戏规则。巴特勒强调普世概念不具备普世性，如果没有文化翻译，确立普世概念的唯一途径就是殖民主义或扩张主义的逻辑。没有超文化的普世性，而普世概念的形式和内涵都因文化区域而异，不同版本的普世概念都应得到尊重和接受。比如说民主，在全世界各地就有不同的版本，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人对民主和现代性等许多概念都有不同的理解。以上我简述了一下本雅明、斯皮瓦克、巴巴、巴特勒等人的翻译理论，我认为他们的翻译论述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全球化时代反霸权的策略和理论依据，这是本文的中心点。

前面我们提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全球化既加强霸权又削弱霸权，在全球化时代，各种概念、语言、议题在各地都有不同的版本，这样一来霸权也就被削弱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整个人文学界、社会学界都是被源自西方，尤其是法国的原理论所影响。法国五六十年代以来真是群星灿烂，他们的理论对世界各地都有影响，尤其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但是后结构主义理论在世界各地都被修改了，这些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人的意志的结果，而是语言本身没有办法避免的。一句话，任何一种理论、概念、习俗、实践，一旦全球化就势必出现不同的版本，借用恰克拉巴蒂的一句话，在全球推行西方思想就等于在全球揭示西方思想的局限性和它的文化地域性。他有几个论点值得重视：“西方思想既不可或缺，又不够充分。”当今世界可以反霸权，可以反西方，但是你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走路不行。如果把西方思想全都废弃，整个思想界、整个学界、整个话语界就要陷于停滞或混乱，这是不可能的。就像鲁迅讲的，提着自己耳朵离开大地，不可能。但是你一味地追随它，不批判它的缺陷和不充分性，也不够，也会误入歧途。这是他的第一个思想，西方思想既不可或缺，又不够充分。